

试论海南岛出土的汉代铜釜

吴慧

铜鼓作为随军征战的器物带往海南，或在海南就地铸造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铜釜尺寸巨大

海南出土的这批汉代铜釜造型奇特，独具特色。首先，从尺寸来看，海南出土的铜釜通高多在30厘米至40厘米，口径多在50厘米至60厘米，与我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大部分铜釜相比，尺寸明显更大。如河南浙川的西汉铜釜高12.2厘米，口径7.5厘米，云南宣威、昭通汉代青铜釜通高不超过20厘米，口径也不超过30厘米，即使是出土铜釜最多的贵州赫章可乐、用于套头葬的铜釜最大尺寸也在高30厘米，口径40厘米以内。那么，尺寸巨大的海南铜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是一个什么概念？作为炊具而言，假设用于烹煮米饭，海南铜釜中尺寸最小者通高22.5厘米，口径32厘米，大小与其他地区出土铜釜相近，粗略计算可供10人左右食用。海南临高调楼出土的铜釜为尺寸最大者，通高74厘米，口径93厘米，计算下来可供上百人食用。但这种超大尺寸的炊煮器用于煮饭并不符合实际使用，应当是用于烹煮肉类和汤的。可以看出，这些大尺寸铜釜并非普通百姓家中所使用的生活器物，应当是集体使用，军队使用的可能性较大，这也印证了铜釜与铜鼓一样作为随军器物带到海南的可能性。

与其他地区的铜釜相比，海南出土的大部分铜釜尺寸巨大，可用“巨釜”来形容。而同样被称为“巨釜”的器物，有陕西耀县的7件汉代巨型铁釜，最大一件口径58厘米，高52厘米。另外，山东掖县出土东汉或更晚期的铁釜，口径66厘米，腹深40厘米，被认为可能是史籍记载的煮盐官器。这两件铁釜与海南出土的铜釜尺寸大小相当，年代也均为汉代，但是材质不同。应是各地铁器化进程不一的缘故，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铁器化程度仍逊于中原地区，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更是如此。此外，虽然山东的铁釜用于煮盐，但海南自明清以来制盐技艺多采用竹盘煮盐和石槽晒盐的方式，巨釜的用途不尽相同。

铜釜形式奇特

海南岛出土的铜釜形式十分统一，除一件尺寸最小者为敞口鼓腹之外，其他均为盘口直腹，



汉代弦纹四耳铜釜 海南儋州洛基出土
海南省博物馆藏



汉代弦纹双耳铜釜 海南东方感城出土
海南省博物馆藏

并且都为圆底、口沿有立耳。圆底直腹形式的铜釜目前并不多见，有广东清远汉代铜釜、广西合浦西汉铜锅、贵州交乐汉代铜釜、云南昭通东汉铜釜以及广西防城港明代铜釜，这几件与海南出土的铜釜都是盘口、直腹、圆底和口沿有立耳，虽尺寸比海南铜釜略小，但形制特点相同，说明同种类型的铜釜在这些地区有所流通，互有内在联系。广西铜釜为明代，说明此种形制的铜釜虽主要见于汉代，但后续或还一直沿用。

从纹饰来看，这批铜釜的纹饰并不多，集中体现在铜釜的腹部和立耳两处。首先，铜釜腹部



汉代弦纹四耳铜釜的耳部



汉代弦纹双耳铜釜的耳部



汉代弦纹双耳铜釜的釜身

的纹饰主要表现为在器腹中部铸有弦纹，也说箍状纹，多为三道。器身饰有弦纹在其他地区的汉代铜釜中多有出现，是常用的装饰手法。其次，铜釜的立耳装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耳部纹样，海南出土的铜釜中除了鼓腹铜釜耳部无纹，以及另一件残缺无耳之外，其他铜釜的立耳均饰有纹样。其中大部分为绳纹，另有辨纹、麦穗纹各一件。二是耳上立像，出自海南临高、儋州、陵水和澄迈的部分铜釜，每只耳的上方都铸有2至3个立体塑像，有牛、羊、象、虎等动物像以及骑马武士像、人像和鸟像。在铜釜上运用立体塑像装饰

手法的比较少见，主要见于西南地区，如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的一件昭通桂家大院出土的立耳敞口铜釜，双耳分别铸有三个立像，云南文山州博物馆的骑士辨纹耳釜，双耳也分别铸有一个骑马武士像。

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中采用立体造像装饰的器物非常多，如贮贝器、铜鼓、杖头和兵器等，且选取的题材都有牛、羊、虎和骑马武士等形象，制作精湛，工艺纯熟。贮贝器是古滇国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铜鼓则多被作为祭祀用器或战鼓，而同样运用了这种复杂装饰工艺的海南铜釜，应当也是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彰显其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以示权威。特别是海南临高出土的六耳铜釜，不仅尺寸最大，而且装饰工艺最为复杂，立耳和口沿上共铸有15个立像，若仅用于烹煮实物并不实际，说明这类铜釜应当同时具有功能性和象征性作用。

历史上对海南地区的铜釜描述极少，仅在南北朝盖弘所著的《朱崖传》中有提到“朱崖俗多用土釜”，又说“朱崖大家有铜釜，多者五百，积以为货”。当时民间多用陶釜，大户人家囤积铜釜，原因可能为当时海南仍未广泛使用青铜器，像铜釜这类器物聚集在少数人手中，是财富地位的一种体现。从侧面印证了海南早期铜器应自外界流入，铜资源的短缺导致铜釜成为岛内大户人家奇货可居的对象之一。

海南出土的铜釜自何处而来？首先，从形制来看，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都有与海南相同形制的铜釜出土，且年代一致，说明汉代这种类型的铜釜广泛使用于我国南方地区；其次，从耳上立像来看，其装饰手法广泛见于以滇文化为代表的西南夷地区，并将之运用到铜釜上。越南北部地区也出土了耳上立像的敞口铜釜，认为多是从西南夷地区传入，并与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部分族群南迁徙有关。海南出土的铜釜虽形制有所不同，但从耳部纹样、立像位置、题材选择等方面来看，应是受到西南夷的青铜艺术影响。因此，海南汉代铜釜的出现，或许与西南夷族群南迁有一定联系，未来或许可以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或科技手段进一步验证。总体而言，独具特色的海南铜釜是多个地区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当时海南岛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相互交流和联系的历史印证。

(海南省博物馆供图)

从巡抚衙门到督军府

——晋商博物院的前世今生

崔灿

形式包括中国传统形式、西方建筑形式以及中西合璧式，整个建筑群的风格和肌理充分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建筑的探索历程，呈现古今交融、中西合璧、风格多样的建筑特色。

阎锡山任督军后陆续对巡抚衙门进行了改建和扩建。1918年至1919年期间，在穿堂、二堂后面，将原内署院拆除并修建了一栋面阔十间、进深两间的二层木楼。1932年至1937年，将原先的巡抚衙门一层门楼改建为重檐歇山式二层门楼，门楼的东西两侧直至巡抚大堂的廊房改建为南北两组对称的廊楼；将原巡抚大堂改建为督军府二层大办公厅，时称一楼；将原大堂后面的穿堂、二堂改建为两座对称的二层建筑，称二楼、三楼，日伪统治时期这两座楼才陆续竣工。1945年日军投降后，阎锡山返回山西，高级官僚搬入二、三号楼办公，此外在一楼的西侧，拆除关帝庙、哪吒祠，修建了西花园及厨房、餐厅、库房等建筑。

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新建了礼堂，称为自省堂，又称梅山会议厅，接着新建了进山钟楼（现为梅山钟楼）。这个时期和1945年日军投降后对明清时期作为达官贵人休息游玩的东花园进行了部分改造和扩建，将其改为阎锡山私人宅院，东花园除阎锡山及其家眷、秘书、侍从外，一般官吏不准随便出入。东花园由西、中、东三个庭院组成，西院称为中和斋，是由一个方庭院和一座西式建筑组成；中院正北的九间厅堂是阎锡山办公起居的地方，坐北朝南，是二进院落布局，现仅存带廊正房以及里院正房，正南面北的回字形院落与南边一座二层水泥凉台楼房是其家属居住的地方，两个院落中间是花园；东院的一座二进四合院，为阎慧卿的住处。东花园各庭院均有回廊相连，门洞相通。

改建后的原督军府仍然沿明清时期的布局，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建筑由南到北依次是门楼、一楼（原巡抚大堂）、二楼、三楼（原穿堂、二堂），其后为四楼、御书楼、自省堂、进山楼（梅山钟楼），中轴线的两侧建有对称的廊楼等附属建筑，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

改建后的督军府旧址在原先的整体布局上取消了仪礼宣教和祠庙的功能区域，其余功能区域将原先的宴息游乐的东花园改为内宅，西边祠庙改为办事功能。目前，从留存下来的几座建筑可以看出基本都是对称布局，但是平面更加富有变化，不再是单一的矩形，而是多采用“凹”字型、“凸”字型、“工”字型等。这种单体建筑平面采用非矩形的情况是近代建筑中才出现的，不过从宏观布局来看，与传统建筑中的主殿加配殿的整体平面布局有些类似。

这一时期新修的建筑在形式和结构上大体都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既带有近代西洋建筑的色彩，又不失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风格，兼容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特点。当然也可以明显看出



晋商博物院俯瞰图



督军府旧址



渊宦堂



自省堂（梅山会议厅）

中、西风格在单体建筑上所占的比例不同，会有不同的效果。

首先，带有中式元素的西式建筑，这类建筑基本都采用西方折衷主义风格，立面装饰有明显



西花园俯视图



梅山钟楼

的西方特点，在一些细节部分，例如在线脚、山花装饰和屋顶增加一些中式元素，而建筑手法却是西式。如二、三号楼和东花园的二层水泥凉台楼房。

带有西式风格的中式建筑，是在立面设计采用传统风格，中式传统大屋顶、木结构与砖结构结合使用，部分装饰采用西方元素，大多体现在外墙使用西式砖柱、在门窗部分运用拱券等方面。如仪门是异性歇山顶，而中间部分为西式石拱券。渊宦堂于1992年翻修时加盖木结构房顶，

晋商博物院原为山西省督军府旧址，明清时期历代巡抚衙门都设在此处，民国时期被延用为督军府，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山西省政府办公场所。巡抚衙门作为一省的高级别地方权力机关，一直处于山西的政治中心。本文通过分析平面布局与风格等特点，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其发展进程以及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从明清巡抚衙门到督军府

晋商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是一座以山西督军府旧址为依托建立的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的人文历史性质的博物馆，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书记载北宋初年曾为潘美帅府，明清时期的山西巡抚衙门都设立于此。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太原取得成功，山西军政府成立，并将办公地点设在这里。1912年3月，袁世凯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称为都督府。1916年7月，改各省军务长官为督军，阎锡山任山西督军，自此改名为督军府。抗战初期为第二战区区长官司令部。太原沦陷后成为日伪山西省行政公署所在地。日军投降后，再度称为督军府。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同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设立于此地。千余年来随着朝代的更迭，督军府历经沧桑，经历了多次修缮、改建和扩建，然而这里一直是山西的政治中心和重大事件决策地。

2017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搬迁新址后，原址开展千年府商综合整治配套工程。在此基础上修建晋商博物院。建设内容包括对督军府旧址及东花园内不和谐建筑拆除，历史建筑修缮利用，以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等。

整体布局与建筑风格

清代传统衙署的平面布局按功能性质分区，可以分为五个区域：仪礼宣教之所、治事之所、宴息之所、吏撰办事之所、衙署内的祠庙。

结合清光绪《山西通志》、清道光《阳曲县志》等记载，可以得知巡抚衙门布局大致是：署前有照壁一座，一对石狮雄踞左右，三座牌坊从东到西排列，文官厅在左，武官厅于右。大门有二，门西设关帝庙和哪吒祠。大门内东、西列书吏房，正北有悬山式大堂，大堂后为川堂，川堂后为二堂。再后是内署，为眷属居地。署北建御书楼，楼东西各有牌坊，东北隅有显灵洞。在横轴线上另有许多附属建筑及东西花园，总占地面积三万余平方米。可见，明清时期的巡抚衙门拥有五个完整的区域，功能完备、秩序严谨。

督军府旧址建筑群多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风格融合的形式，整个建筑布局中轴对称，均属于民国后督军府时期修复、修建。建筑

大堂前辟面宽三间的卷棚歇山顶抱厦，正立面为石质，由半圆形壁柱、圆拱门构成。自省堂主体为中式结构，内部为木质结构，外部为西洋式砖石结构，并有西式拱形门窗，四角是攒尖式的角楼。整个建筑中西合璧，浑然一体。

总体来说，西式建筑风格在这里的运用主要集中在西方折衷主义风格上，将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和中国传统样式相结合，形成了这几座西式风格更为明显的建筑。而中式风格在木雕、砖雕和彩绘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所以近代建筑也充分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崇尚中西结合的时代潮流。

山西——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

山西督军府旧址是中国唯一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从宋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作为政治中心的督军府建筑群，在全国以及在山西历史上具有重要性。

1911年10月29日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宣布起义，攻入城内巡抚衙门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辛亥革命在太原取得成功，成立了山西军政府。1937年，周恩来与阎锡山在省自省堂多次洽谈联合抗日事宜。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在东花园中和斋主持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军事会议，研究抗日守卫太原，周恩来、彭雪枫等人出席了会议。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日伪政府入驻督军府办公。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25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的首长及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人等进入督军府，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正式成立。

督军府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策源地。

使命的终结与功能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省政府驻地于此，领导了山西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7年它完成了其历史使命，2020年这座建筑变成了博物馆对广大游客开放，实现了其功能的华丽转身。

博物馆的东花园区域并未开放，参观区域分为中、西两个部分，中线为“天下晋商”基本陈列展，通过六个板块集中展示晋商的发展历史，全面再现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西区是游客休闲服务区，以园林建筑景观为基础，形成开放式的区域游园。从2020年开放至今，晋商博物院已经接待游客约194万，并在各大节假日举办相关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

山西太原自古即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战略重镇，而督军府旧址由于沿用明清时期巡抚衙门，虽中间有过改建和扩建，但整体的布局基本保存下来，为研究近代建筑的布局与建筑特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